

未輟集

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未 輟 集

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选

许嘉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7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辍集/许嘉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3

ISBN 7-5004-2718-2

I. 未… II. 许…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96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35.00 元

自序

每读前辈论文集，都要感叹：他们那一辈人生活的年代，国无宁日，其中许多人，家境贫寒，时为温饱奔波，但是却出了那么多大师级的学者，写出那么多好文章。

我所说的前辈，大多是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在学术的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至今还需学人仰视的巨人。这或许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值得好好研究。我甚至认为，写那段时间的学术史，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还算不上真正的史。

我对此没有研究。但我觉得，抛开社会的、历史的、学术的原因不说，那一代人中华传统文化底子之厚，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因。旧式的教育固然浪费了他们的许多精力和时间，但是也给了他们至少两样东西：一样是传统道德中积极的一面，即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清高。另一样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由此产生的对中华古国的热爱与忠诚。试看那一时期的学者，有几人是不关心国事，不积极投入一场接一场新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又有几个革命者不是学者的？“双肩挑”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我们这一代呢？固然也经历过动荡、挫折，但是如果放眼一

生，总环境还是要比前辈强得多。我们的学术功底和成绩呢？环顾宇内，似乎大师级的学者一个也未见。

我读前辈著作常想到自己，每次都感到心虚。我1954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40年来，除了动荡的年代有八年没教书，从未脱离教学与研究。其间，得从陆宗达（颖明）、萧璋（仲圭）、俞敏（叔迟）先生游，又曾问学于南北众多先辈名家。应该说，我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但是，时值又一个世纪之交，我的成绩又如何呢？应该说：实在对不起教我爱我的前辈们。条件如此优越，何以至此？细想想，就主观而言，底子薄，不得法，有些光阴虚度了，恐怕是其三大主要内因。

早在前几年，就有朋友和学生催促我把论文结集，我始终不肯。无他，就是觉得这等于让我向那些偏爱我的前辈们交一份答卷，实在拿不出手。如果书印出来了，在图书馆里按类排放，是要和前辈与时贤的著作“比肩”而立的，则吾岂敢？由于我的坚持，其事遂寝。不料到了今年，有几位学生竟然硬干起来。我一向不注意保存已经发表的东西，有些文章发表于何时何刊，我也记不得了，而他们居然把主要的文章大体搜集来了，而且立即送交出版社。待到校样来了才让我“过目”，并且命我在书前再写几句话。于是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心里是怎样以前辈们为标杆而又自愧的，以及论文集将要面世时的惶恐。如果有比我年轻的同道看了，能够以我为镜，隔代而承，以我的师辈们为楷模，更加注重功底，更加珍惜机遇和年华，则其收获或将比看我的这些文章更大，更有用。

历来中国人有了孩子总要起个名字，而且还要赋以父母的意愿。这个集子，虽然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也还是要有个名字的。因为自己是无成，但主观上从不敢小辍，即使再忙也要让读书、教学和写作不绝如缕，因此名之曰“未辍”，意在自励耳。

最后我要说的是，此集之成，朱生瑞平（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用力最多。于今出版繁荣洛阳纸贵之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惜影响效益而出我这本既不能使之获利，又不能令其扬名的书，我是很感佩的，当然应该在此深表谢意。

1999-11-27

于日读一卷书屋

目 录

论语言学基础学科的现状	(1)
语言文字学的传统：辉煌过去	(20)
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33)
语言文字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67)
训诂学的衰微与复兴	(83)
论训诂学的性质及其他	(89)
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	(114)
关于训诂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124)
《说文解字》在词典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135)
《说文解字》释义方式研究	(169)
说“正色”	
——《说文》颜色词考察	(197)
答《古汉语研究》编辑部	(210)
苍史功臣 叔重诤友	
——《说文》杨氏学述略	(213)
《尔雅》的分类与分卷的再认识	
——《尔雅》的文化学研究之一	(235)
略论杨守敬《水经注疏》	(254)
《黄帝内经太素》杨注例评	(265)

《文选》黄氏学训诂探赜	(284)
论同步引申	(326)
注释学刍议	(343)
韩愈不严守文言语法析	(364)
“句本位”与古代汉语词类研究	
——纪念《新著国语文法》出版六十周年	(380)
关于“唯……是……”句式	(393)
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研究之比较	(403)
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	(414)
科学研究近代俗语的先驱	
——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 100 周年	(454)
礼、俗与语言	(466)
说“今译”	(475)
汉字形符的类化与识字教学	(484)
汉字声符的分化与识字教学	(496)
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榷	(505)
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榷 (续)	
——兼论注释学的研究	(518)
“三”也可以表示“少”	(534)
陆宗达先生《说文解字通论》序	(539)
《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序	(542)
新印王引之《经义述闻》弁言	(547)
曹述敬先生主编《音韵学词典》序	(559)
校点本《说文解字读》序	(562)
《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序	(565)

论语言学基础学科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语言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和发展。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量输入，许多分支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改进，并迅速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和交叉的学科，其中不少是应用学科。与此同时，传统的基础学科的研究也得到加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古文字研究

随着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量沉埋在地下的文物文献陆续出土。这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发现，例如 1973 年在河南小屯南地、1991 年在安阳花园庄和 70 年代在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发现的大批甲骨文资料，1976 年扶风出土、1974—1981 年在宝鸡出土的大量西周有铭文的青铜器，1975 年在湖北发现的睡虎地秦简，1979—1980 年在四川、1986 年在甘肃、1993 年在湖北陆续出土的竹简木牍，等等。

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进展明显，收获颇丰。一是对古文字的识读成果迭出；二是对古文字发展脉络的认识更为清晰；三是研究方法得到了改进；四是古文字资料的集大成之作陆续问世。

对古文字的识读，每年都有大量文章发表。这方面的成果除

散见于各种刊物和论著中的以外，古文字学会（1978年成立）与中华书局合编的《古文字研究》（至今已出版19辑）是集成的代表。在众多的各种古文字字典、类编中，也都吸收了识读工作的成果。识读古文字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还是依靠字例、文例。

古文字发展脉络问题，也包括了一些资料的分类和时代判断问题。例如关于甲骨文断代的标准和步骤的讨论，关于秦隶的形成、秦隶在隶书发展演变中的地位的研究，战国文字形体特点、战国时代各个地区文字间差别的研究，都对研究汉字发展史，特别是古文字发展史，有重要的意义。

古文字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在甲骨文方面，要特别提到甲骨的分类和断代的步骤问题。李学勤曾经提出过分类和断代应该分成两个步骤进行的意见^①，近年来才受到重视，并用于实际的分类和断代工作^②。铜器的断代研究对金文的研究关系重大。这方面研究的方法也取得了进展，即选择确实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群（窖藏和墓葬铜器群）通过同群和不同群各器间的纵横关系进行系联考证，以推断铭文时代的先后。

古文字资料集大成之作，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甲骨文合集》（1979—1982）、《小屯南地甲骨》（1980）、《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6）、《睡虎地秦墓竹简》（1990）、《古玺汇编》（1981）、《印典》（1993—1994）、《金文编》增订版（1985）、《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古玺文编》（1981）、

① 李学勤：〈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古学报》第三期，1957。

② 例如黄天树：《殷墟王卜辞分期分类研究》，天津出版社1991；彭裕商：《殷墟甲骨文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参看沈培：《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汉字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古陶文汇释》(1990)、《甲骨文诂林》(1996)、《甲骨文字典》(1988)等。大型资料汇编和字典的出版,不但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这批书的出版也是对出土资料研究整理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另外,华东师大从80年代末开始编纂《古文字诂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进行“全汉字库”的研制(1992—),也是古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和在古文字研究中使用现代化手段的有益尝试。

这一时期有不少各有新意的古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出版,也是重要的收获。例如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林云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陈炜湛与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等,都是很优秀的著作。这批著作的出版对于古文字学在大学中的教学、研究生的培养和关于古文字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二) 上古汉语的研究^①

改革开放以来,对上古汉语的研究也比五六十年代活跃多了。若论成绩,则音韵学居首,语法次之,词汇和词义(包括训诂学)居末。

^① 过去人们用“古汉语”一词统称现代汉语之前的汉语,实际上主要是指上古汉语。近些年近代汉语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注意,而且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所以常常用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词分指古代汉语的两个阶段(对二者的分界线至今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到具体的分支,例如音韵学里,则没有分成上古音韵学、近古音韵学,而只称上古音、今古音;有时“古代汉语”还用来泛指现代汉语前的汉语。这可能也是“统言不分”,“析言则别”。

1. 音韵学

据邵荣芬先生 1993 年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共出版音韵学专著近 80 种，论文 900 多篇。^①

上古音研究的进展，较多地集中在上古韵音值的构拟、上古声母有没有复辅音、古音韵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表述等方面。这也是到现在为止大家意见很不一致的地方。至于过去争论得较多的一个韵部的主要元音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则已经基本趋于一致。

关于上古声母，有没有复辅音一时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个问题从 30 年代起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始终悬而未决。持有复辅音者的主要根据为上古谐声系统（在同一谐声系统中，声母分别为两个或更多的辅音）和“不聿为笔”一类的所谓“合音字”。反对者的理由是若依上古谐声系统去拟测，则汉语在上古将有二、三十种复辅音，声系既乱而复杂，难以想象先民怎样用声母间区别这样细微的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同时在后代汉语声母系统中也几乎找不到蛛丝马迹，难以解释复辅音何以忽然完全丢失；对“不聿”之类，则认为是一种合音，或用古代复音词演化的规律加以解释^② 80 年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总体上看，较之几十年前深入不少。论者引为证据的，除了谐声系统，还较多地引用方言、亲属语言。应该说，所言大多成理。现在反对者虽少，但是对其所进行的驳论似乎还不能给以彻底的回答。学术问题是不能以多数少数作为判定标准的。因此，这一问题一时还不可能算是有了十分牢靠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① 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② 刘又辛：《古汉语复辅音说置疑》，《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4。

对古代韵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切韵》系韵书早在 50 年代以前就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近 20 年来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原音韵》、《中原雅音》、《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音韵阐微》等书,都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门。研究的重点为这些韵书的性质、其音系所属地域、当时是否还有入声,以及这些韵书间的关系,等等。对等韵学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之一。

古代音韵学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评述,集中体现于整理和重印古代韵书和音韵学著作、编写工具书,以及撰写音韵学教材和通论性著作两个方面。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从《切韵》残卷以来到清代的主要韵书和音韵学著作,已经基本上重印出版。像周祖谟先生的《唐五代韵书集成》(中华书局 1983)、李新魁先生的《韵镜校正》(中华书局 1983)等,并不是单纯地集或校,而是在整理中充分吸收了已有成果。至于像周祖谟的《〈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中华书局 1980)、丁声树、李荣先生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 1981)等工具书,虽为普及之作,意在帮助人们直接解决古今音对照的实际问题,但却包含着作者对古音学成果的审慎去取,其科学水平和学术价值是很高的。从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末,在大学课堂上,音韵学曾经有过一段“红火”期。开设音韵学的学校迅速增多,因此众多的音韵学教材和通论古代音韵的论著也应运而生。其中不乏述而有作的佳品,时时可见作者的研究所得。

在这一时期的音韵学研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研究古音以方言和同时代域外(朝鲜、日本、越南等)译音、佛经译文中的梵汉对音为材料。这既是传统音韵学所缺乏的,也是本世纪以来古音研究虽已开其端但是材料的搜集和运用都不够理想的方面。

2.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据郭锡良先生统计，从《马氏文通》到 40 年代末，“半个世纪中有关古代汉语语法的论文总共不到 60 篇，除文言语法、文言虚词的著作外，没有一部有关古代汉语语法的专著。……40 年来，仅《中国语文》发表的古汉语语法论文就有 175 篇：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书刊发表的古汉语语法的专著超过 1300 篇。文言语法、文言虚词和古汉语教材以外的古汉语语法的专著出版了 20 种以上。”^① 而据唐钰明先生的统计，数字虽与郭氏有所出入，但是同样能够说明本世纪前半叶和自 50 年代以来 40 年的对比^②：

前五十年	后四十年	前后的数量比
研究者 59 (人)	632 (人)	1:10.7
著作 31 (部)	221 (部)	1:7.1
论文 113 (篇)	1457 (篇)	1:12.9

这一时期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比较全面，既有词法（如代词）、句法（如处置式、被动式、双宾语等）、虚词的专题研究，也有断代的和专书的语法研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比较深入。例如程湘清先生主编的《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和《两汉汉语研究》（同上，1984）集中了一批很有水平的专题论文；此外像朱德熙先生的《关于先秦汉语里名词的动词性问题》（载《中国语文》1988 年第二期）、李佐丰的《文言实词》（语文出版社 1994）和郭锡良、王克仲等先生近年的研究成果，

① 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载《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② 唐钰明：《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①。至于像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 1958)、《汉语语法史》(在《汉语史稿》中册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华书局 1989)和吕叔湘先生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1985)虽然由于成书较早,对后来语法学界的新成果吸收较少,但是他们在研究方向和方法方面给予后学的启示以及在具体语法问题上的卓越见解,更是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页。

近 20 年古汉语语法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向还是研究方法,都是在前 40 年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和发展的。唐钰明说: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首先以系统的动态研究来取代既往的静态研究,将人们的视界由单一的平面引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样一个历史延续体。……它所建立的汉语语法史框架,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稍后,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以其扎实的材料、新颖的构思,对上古、中古语法的不同层面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所不足的是略显庞杂,而遗憾的是未能终卷。至于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汉语语法史的构建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时观念的确立和语法史体系的构建,为古汉语语法研

① 郭的论著如《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商务印书馆 1980)、《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 1989)、《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第一届国际中国先秦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 1994)、《先秦语气词新探(一)(二)》(《古汉语研究》1988 年创刊号;1989 年第二期)等。这些文章后收入《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 1997)。王的论著如《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分类》(《辽宁大学学报》1989 年第五期)、《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中国语文》,1986 年第一期)及《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等。

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给这个领域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①

上面所引的最后一句话可谓道出了近 20 年古汉语语法研究与前此的研究区别最为显著的普遍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 20 年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论著中，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已经成为学者们普遍自觉使用的方法。

例如，殷国光先生的《〈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华夏出版社 1997），“对《吕氏春秋》的词类进行全面的、量化的研究，力图勾画出周秦之交汉语词类系统的基本面貌；并以专书量化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对前人关于词类研究的理论、方法、结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探讨……有待澄清的各种问题。”^②

作者在研究这一课题之前，已经参与了《吕氏春秋译注》和《吕氏春秋词典》的编纂工作，为课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的一大特点是为读者提供了大量详细的统计数据。例如，作者把《吕氏春秋》的词汇分为 11 大类，并列举出各类词的数量、比例、频度。作者还统计出在《吕氏春秋》中实词占词汇总量的 98.5%，频率为 12.68；虚词占词汇总量的 1.5%，频度为 204.93；兼类词 452 个，约占词汇总量的 8.8%；等等。在分述各个词类时，作者也一律用数字说话，对各类词做了详尽的研究。胡明扬先生评价该书的特点时说：

作者又广泛地采用了量化的研究方法，用统计数据来校

① 唐钰明：《四十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② 见上书第 2 页。

正主观的判断，……偶尔在个别问题上使用统计方法现在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一部专书进行全面穷尽的统计分析，至少在国内还没有见到过。经过统计数据的校正，再根据句法功能来分类，至少比完全凭主观判定要可靠一些。作者的结论不可能是最后的结论，将来会有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作者的贡献是摸索了一条处理古代汉语材料的新的路子，尽管这样的新路子也需要不断修正和改进。^①

殷国光虽然运用了新的方法，所得出的词的类别也与前人不尽相同，但是并不是“另起炉灶”。作者说：

近百年来，关于古代汉语的词类问题，语言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词类的划分或粗或细，少则几类，多则十几类，但总的说来，大的格局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对《吕》的词划类时，并未另起炉灶，而是沿用了前人关于上古汉语词类的分类及名称，目的在于，以《吕》量化的语言材料为依据，检测前人关于上古汉语词类的基本格局；并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着眼于同一大类的词在入句之后呈现出的不同变化，着重描写词的大类内部词组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的差异。^②

由此可见，殷国光不仅是在探索一条“新的路子”，而且是在恢复和发扬作为实证学科应有的学风：扎实而朴素、继承而不默守。

① 见《〈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序》，第3页。

② 见上书第12页。